

20 世纪以来《弥勒会见记》研究综述^①

李 梅

内容提要: 本文从《弥勒会见记》文本、版本、释读、成书年代、文学体裁、宗教、语言等方面,对 20 世纪以来的《弥勒会见记》研究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 《弥勒会见记》 吐火罗文 回鹘文 戏剧史 弥勒信仰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743 (2014) 02—0127—11

DOI: 10.3969/j.issn.1002-4743.2014.02.014

20 世纪初德国考察队从新疆盗掘并带走《弥勒会见记》残卷,1959 年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和 1975 年吐火罗文 A (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在哈密和焉耆的发现,引起了国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我国民族史、戏剧史、宗教史等的研究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②《弥勒会见记》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黎蔷、杨富学等学者曾做过一些梳理,^③随着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勾勒《弥勒会见记》的研究轨迹显得很有必要。

一、关于《弥勒会见记》的文本和版本

《弥勒会见记》描绘了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主要叙述了弥勒离开师傅、离开家乡、赴正觉山会见佛祖释迦牟尼并拜其为师,获得佛果成道,成为未来佛的故事。根据书写文字的不同,《弥勒会见记》有吐火罗文和回鹘文两种写本。研究者根据回鹘文本的第三章结束语的一段原文判断,它首先是由梵语译成吐火罗语(此处指古焉耆语),而后又从吐火罗语译成回鹘语。^④梵文本至今未见,就现存两种写本又可根据收藏地的不同,分成不同的版本。

(一) 吐火罗文 A (焉耆文) 《弥勒会见记》根据收藏地点的不同分为两个版本 “德国本”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库》编纂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124)阶段性成果。

② 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羨林文集》第 11 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5 页。

③ 黎蔷《中国最早佛教戏曲〈弥勒会见记〉考论》,《中华戏曲》1999 年第 2 期;黎蔷《20 世纪西域古典戏剧文本的发掘与研究》,《文学遗产》2003 年第 4 期。杨富学《百年来回鹘文文学研究回顾》,《西域研究》2000 年第 4 期;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2001 年第 3 期。郑玲,雷宁《〈弥勒会见记〉述评》,《文艺评论》2013 年第 2 期。

④ 斯拉菲尔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章简介》,《新疆社会科学》1982 年第 4 期。

和“新博本”。学界通常认为吐火罗文有两种方言,“A方言主要在焉耆地区流行”,“B方言流行地区主要在库车(龟兹)。”^①德国探险家1906年5月在新疆焉耆的舒木楚克遗址首先发现吐火罗文A本《弥勒会见记》。德国学者泽格(E. Sieg)和泽格陵(W. Siegling)将这些残卷以拉丁字母转写,他们的研究《吐火罗文残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1921年在德国出版,被季羨林称之为“德国本”^②。

1975年3月,新疆考古工作者在焉耆七个星千佛洞北大寺发现了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季羨林先生对其进行了鉴定和研究,^③此即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新博本”。季羨林于1998年在柏林和纽约出版了“新博本”《弥勒会见记》的英文译释专著。^④他认为“德国本数量并不少,只是很分散,连续在一起的比较少。……以幕数而论,德国本要比新博本多,但不像新博本这样集中,新博本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第一、二、三、五四幕,而德国本则范围要大,详细的幕数目前尚无法确定。”^⑤

(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根据收藏地点的不同,亦可分为“德国本”和“新博本”,但我们习惯将后者称为“哈密本”。

上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木头沟和胜金口等处发现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叶,德国学者葛玛丽(V. Gabain)于1957年^⑥和1961年^⑦影印刊布了保存在德国梅因茨和柏林两处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卷,她认为残卷共有六种写本,两种为“胜金口本”、两种为“木头沟本”,其余两种的出土地点尚未查明,^⑧以上诸种皆归为“德国本”。

1959年4月在哈密县天山公社脱木耳提出土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吴震报道了发现过程和写本形制。^⑨我们习惯称之为“哈密本”。这个本子“最后两章已缺,现存一个序文和正文二十五幕。这是《会见记》篇幅最多、内容最为完整的一次发现。”^⑩1988年,耿世民与德国学者克林凯特(Klimkeit)共同协作出版了“哈密本”的德文译释本。^⑪“我国哈密本《会见记》写本虽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德国考古队以前在吐鲁番地区所得的本子,但仍不是完本。”^⑫

① 季羨林《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文史哲》2001年第1期。

② 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羨林文集》第11卷,第15页。

③ 季羨林《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

④ Ji Xianlin, Werner Winter, Georges-Jean Pinault, *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中国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1998。

⑤ 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羨林文集》第11卷,第15页。

⑥ Annemarie von Gabain, *Maitrisimit. Faksimile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asika-Schule*. (I). facsimile hrsg. v. Annemarie v. Gabain.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Helmuth Scheel. Wiesbaden, 1957.

⑦ Annemarie von Gabain, *Maitrisimit. Faksimile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asika-Schule*. (II). facsimile hrsg. v. Annemarie v. Gabain.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Richard Hartmann. Berlin, 1961.

⑧ 参见斯拉菲尔·玉素甫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⑨ 吴震《哈密发现大批回鹘文写经》,《文物》1960年第5期。

⑩ 《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5年,第535页。

⑪ Geng Shimin und Hans-Joachim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8.

⑫ 耿世民《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试刊)。

(三) 其他版本情况。泽格和泽格陵及葛玛丽在其著作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新疆有关弥勒的其他诸多文本的文献,致使很多学者以为《弥勒会见记》还有几种完全不同的梵文本、巴利文本、于阗文本、藏文本、汉文本、粟特文本。^①季羨林先生明确指出,以上种种皆为《弥勒授记经》的范畴。他认为新疆发现的诸种语言的弥勒文献,主要包括了《弥勒会见记》和《弥勒授记经》两个系统,两组佛典内容情节基本相似,但《弥勒会见记》内容要丰富得多。《弥勒授记经》短而《弥勒会见记》长,后者把前者包括在里面了,西方一些专门探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没把这个问题搞清楚。^②通过季氏的详细阐述,我们了解到《弥勒会见记》的异本,除了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及所从来的“印度文”本和葛玛丽所提及的粟特文本,再无其他,但可惜后两者均至今未见,前者不知是梵文抑或其他文字,后者“至今还笼罩在一团迷雾中”^③。

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的关系,季羨林先生认为“这两个本子,虽然在不少地方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则几乎是字与字句与句都能对得上的,称之为翻译完全符合实际情况。”^④耿世民进一步认为,文献中称吐火罗本是从梵语制成的,回鹘文本是从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而所谓制成可能是根据梵语本编成,而不是译本,可能只是假托之辞,实则为当地产物,很可能是受到伊斯兰民族文化的影响所致。^⑤郎樱从语言、叙事方式等方面分析译本亦认为:“哈密回鹘本《弥勒会见记》所具有的突厥文化、回鹘文化的特点是鲜明的。”^⑥

二、《弥勒会见记》的释读

经过学者们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吐火罗文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终于有了完整和系统的译释本。

(一) 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的刊布及译释。1921 年泽格和泽格陵在《吐火罗文残卷》中刊布了包括拉丁字母转写的“德国本”^⑦,同“新博本”只有两面相同。“新博本”的刊布和译介则由国内唯一精通吐火罗语的专家季羨林承担,他以“德国本”和回鹘文“哈密本”为参

① 参见斯拉菲尔·玉素甫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章简介》,《新疆社会科学》1982 年第 4 期。黎蔷:《印度梵剧与中国戏曲关系之研究》,《戏剧艺术》1986 年第 3 期。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弥勒会见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② 参见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羨林全集》第 11 卷,第 22~123 页。

③ 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羨林全集》第 11 卷,第 121 页。“von Gabain 先说,粟特文本没有发现。以后又说,Olaf Hansen 在 *Jahrbuch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39, s. 68 极简短地讲到一个粟特文的关于弥勒的书。此书至今未见。”

④ 季羨林《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北京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

⑤ Geng Shimin, Hans. Joachim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ue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8.

⑥ 郎樱《西域佛教戏剧对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贡献》,《民族文学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⑦ E·Sieg. W·Siegling,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Leipzig*, Berlin, 1921.

考,对“新博本”进行了系统的转写和译释,不仅发表了多篇汉文译释的论文,^①还与德国温特(W. Winter)和法国皮诺(G. Pinault)合作,刊布了英文译释本,^②出版了中英文合体的专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③,“是当今世界对《弥勒会见记》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这一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④

(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译介。最早对“德国本”进行介绍的是德国的缪勒,1907年,他在《对确定中亚的一种不知名语言的贡献》^⑤中刊布了此书的一段跋文,1916年,他与泽格合作发表的《〈弥勒会见记〉与“吐火罗语”》^⑥中又将回鹘文本和吐火罗文本中的若干段落分别译为德文,加以对照,认为前者确系译自后者。1957年和1961年,葛玛丽将这些残卷刊布。1980年,土耳其学者色那西·特肯(Sinasi Tekin)在其书《〈弥勒会见记〉回鹘文译本研究》^⑦中完成了对所有“回鹘本”残卷的转写及德文译释。1997年,劳特(J. P. Laut)又对其进行了新的研究。^⑧

最早对“哈密本”进行介绍的是冯家昇,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发表了一些汉译文和评介。^⑨80年代以后,以耿世民^⑩、李经纬^⑪、斯拉菲尔等^⑫为代表的学者们发表了译介及研究论文。斯

- ① 季羨林 《吐火罗文中的三十二相》,《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第十五和十六张译释》,《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第41、20、18张六页译释》,《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文——对新疆博物馆本(编号76YQ1.16和1.15)两叶的转写、翻译和注释》,《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3期等。
- ② Ji Xianlin, Werner Winter, Georges-Jean Pinault, *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1998.
- ③ 季羨林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羨林文集》第11卷。
- ④ 郁龙余 《中国翻译史上的破天荒之作——读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 ⑤ F. W. K. Mueller: *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 SPAW, 1907.
- ⑥ F. W. K. Mueller und E. 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BAW, 1916.
- ⑦ S. Tekin, *Maitrisimit nom bitig. 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asika-Schule*, Berlin, 1980.
- ⑧ J. P. Laut, *Alturkische Handschriften Maitrisimit*, Stuttgart, 1997.
- ⑨ 冯家昇 《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1962年第7、8合期。
- ⑩ 耿世民 《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试刊)。《新发现的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品第十四叶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注:其译释论文主要以德文发表在外文期刊上,后又将其收入《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和《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具体内容请参见以上二书。
- ⑪ 李经纬 《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初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续》,《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2期合刊。《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首品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
- ⑫ 斯拉菲尔等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章简介》,《新疆社会科学》(维文版及汉文版)1982年第4期。《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幕1—5叶研究》,《新疆大学学报》(维文版)1982年第1期。《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章简介》,《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品(1—5叶)研究》,《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新疆文物》(维文版及汉文版)1985年第1期。

拉菲尔等 1987 年合作出版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 1 卷,^① 整理刊布了序言部分与前四章, 包括原写本图本、转写、现代维吾尔语与汉文的译文、内容考释等。1988 年, 耿世民与德国学者克林凯特共同协作出版了“哈密本”的德文译释本。^② 这两部专著共同代表了上个世纪哈密本《弥勒会见记》译介及研究的新水平。2003 年, 耿世民将发表于国外的德文译释论文收入《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③ 中, 2008 年, 他又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出版了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文译释本《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④, 通过与德国本的比对, 补全了共计二十七章的内容, 包括拉丁字母的转写、翻译和注释, 导论部分对文本的创作、抄录、发现、收藏和版本等情况也做了说明, 并就《弥勒会见记》的主要内容、文体及弥勒佛做了介绍, “该书可以称得上是代表我国乃至世界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⑤

总之, 目前所见最系统的《弥勒会见记》全译本, 一是季羨林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二是耿世民的《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外学者经过长期的努力, 从零散的刊布、转译、注释论文到专著的结集出版, 不仅使《弥勒会见记》的译介趋向系统化, 更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三、《弥勒会见记》的成书年代

关于《弥勒会见记》的成书年代, 德国学者托马斯 (W. Thomas) 认为吐火罗文残卷写成于 6 至 8 世纪之间, 比回鹘文残卷早三四百年。^⑥ 季羨林基本同意上述观点, 认为“时间估计为唐代”^⑦。

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成书年代, 国内外学者分歧则较大。有三种说法: (1) 公元 8 ~ 9 世纪形成说。此观点以葛玛丽、色那西·特肯和耿世民、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为代表。葛玛丽在 1957 年发表的研究文章中认为该本抄于 9 世纪, 译书年代则更早一些。^⑧ 1970 年土耳其学者色那西·特肯^⑨则根据葛玛丽所刊的一件文献中的施主名为 Klanpatri (来自梵文 Kalyanabhadra, 意为“普贤”), 与高昌出土的公元 767 年回鹘文庙文中的施主为同一人, 他结合该写本的字特点, 认为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成书于 8 世纪。德国学者勒柯克依据吐鲁番出土的“胜金口本”《弥勒会见记》所具有的语言与文学特征, 认为约形成于公元 8 ~ 9 世纪。

① 斯拉菲尔等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 1 卷,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② Geng Shimin und Hans-Joachim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8.

③ 耿世民 《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④ 耿世民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⑤ 张建国 《一部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的巅峰之作——评耿世民著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⑥ 季羨林 《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 《文物》1983 年第 1 期。

⑦ 季羨林 《吐火罗文 A (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 《社会科学战线》1990 年第 1 期。

⑧ Annemarie von Gabain, *Maitrisimit. Faksimile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asika-Schule*. [I]. facsimile hrsg. v. Annemarie v. Gabain.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Helmuth Scheel. Wiesbaden, 1957.

⑨ S. Tekin, *Zur Frage der Datierung Uigurischen Maitrisimit*, MIO, 16, 1970.

耿世民认为“根据此书现存的几个写本文字都属于一种古老的所谓写经体,再考虑到当时高昌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况(当地操古代焉耆语的居民在8~9世纪时应已为操突厥语的回鹘人所同化吸收),我认为《弥勒会见记》至迟应成书于8~9世纪之间。”^① 斯拉菲尔等之前主张“哈密文本是在高昌回鹘汗国(公元850~1250年)初期抄成的”^②,后来又“认为成书于八一九世纪之间的观点比较正确”^③。张龙群通过对《序章》的研究,认为“此抄本的成书年代当在高昌回鹘汗国建立王朝二三十年以后,也就是公元九世纪下叶”^④。

(2) 公元10~11世纪形成说。持10世纪形成说的主要是法国学者哈密顿(J. Hamilton)与我国学者冯家昇。1958年,哈密顿根据葛玛丽发表的影印本发表书评,就该本字体与敦煌出土的属于10世纪之大部分回鹘文写本字体相同为据,认为应属10世纪。^⑤ 冯家昇则认为译经的年代不应早于840年回鹘人西迁之前,也不能晚到11世纪以后。“至于十一世纪以后则又太晚,可能那时候当地人经二三百年之久已被回鹘人融合而不通吐火罗语(按指古代焉耆语)了”^⑥,故主张此经翻译于10~11世纪之间;耿世民在1980年发表的《唆里迷考》一文中认为,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成书于10世纪左右。^⑦ 1981年他又提出新的看法(见前文),在1988年与克林凯特合著的德文《弥勒会见记(前五品)》中耿世民又认为藏于德国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诸本可能译成于9~10世纪,而哈密本则抄成于1067年。^⑧

(3) “羊年”说。以多鲁坤·闾白尔和耿世民为代表,同样是“羊年”,前者持公元767年说,后者则认为是公元1067年。多鲁坤·闾白尔^⑨认为《弥勒会见记》形成于公元767年,其依据是《弥勒会见记》的序言中“把此功德首先施向我们的登里牟羽颌毗伽狮子登里回鹘可汗陛下”,公元767年是羊年,是牟羽可汗当政时期,也是回鹘汗国的昌盛时期;他还以色那西·特肯的意见(即施主名为Klanpatri与高昌出土的公元767年回鹘文庙文中的施主为同一人)作为助证,证明《弥勒会见记》抄写于公元767年。耿世民则推算“羊年闰三月”是公元1067年。^⑩ 曲六乙则结合彼时印度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佛教、译经及佛教诗人、剧作家马鸣在西域的深远影响等,认为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出现早于767年。^⑪

四、《弥勒会见记》是戏剧吗

《弥勒会见记》的文体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它是否是戏剧。

①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1981年第12辑。

② 斯拉菲尔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章简介》,《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品1—5叶研究》,《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

③ 斯拉菲尔等《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

④ 张龙群《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简论》,《新疆艺术》1992年第5期。

⑤ J. Hamilton, *Review of A. Von Gabain, Maitrisimit*, T'oung Pao 46, 1958.

⑥ 冯家昇《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1962年第7、8合期。

⑦ 耿世民《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⑧ Geng Shimin, Hans. Joachim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ue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8.

⑨ 多鲁坤·闾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戏剧》1989年第1期。

⑩ 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导论》,第4页。

⑪ 曲六乙《〈弥勒会见记〉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戏剧文本》,《剧本》2010年第8期。

(一) 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的文体之辨

吐火罗文本出现了剧本 (nātaka) 这个名称, 泽格和泽格陵 1921 年认为其戏剧的性质模糊而淡薄, 因此否认它是一个剧本, 尽管他们看到了标明其戏剧特征的名称及“幕间插曲终”、“全体下”等舞台术语, 但仍说“我们的本子是用散文夹杂着韵文写成的, 完全是叙事的, 一点也不让人想到是戏剧, nātaka 这个名称标明它应该是戏剧。”“可是从内容上来看, 这部作品一点也不给人戏剧的印象。它同其他散文夹诗的叙事文章一点也没区别。”³¹年后, 他们承认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剧本性质。不仅认为舞台术语是戏剧的标志, 而且认为“丑角”的出现证明其必定是戏剧无疑。^① 其实在泽格和泽格陵以前, 法国学者列维 (S. Lévi) 早已认为这是一部戏剧: 既然有 nātaka 这个词儿, 又有一些舞台术语, 这当然就是戏剧无疑了。^② 之后, 温特又根据动词时态的变换只限于戏剧, 进一步肯定了它的戏剧性质。^③ 吐火罗文“德国本”是剧本的标志有四: (1) 文本中有 nātaka (剧本) 这个词; (2) 有“幕间插曲终”、“全体下”等舞台术语; (3) 有丑角; (4) 有动词时态变换。

季羨林在《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一文中就“新博本”的文体进行了研究, 他说: “这一部书不是经, 而自称是剧”, 是“一部叙述弥勒会见释迦摩尼如来佛的剧本”^④。又在《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中进一步指出: 文本名称“Maitreyasamiti-Nātaka”中的“Nātaka”来自梵文, 释义“剧本”, “既然自称剧本, 又用幕这个字, 那么它不是剧本又是什么呢?”^⑤ 后来季氏又将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联系起来考察, 明确指出,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无论在形式方面还是在技巧方面, 都与欧洲的剧本不同。带着欧洲的眼光来看吐火罗剧必然格格不入。”^⑥ 当然, 这个吐火罗文剧本严格说起来, “它只是一个羽毛还没完全丰满、不太成熟的剧本。”^⑦ 他进一步指出“《弥勒会见记剧本》产生时代至晚是在唐代。这样一来, 中国戏剧史一下子就拉长了六七百年。真正的戏剧史也应该重写了。”^⑧

(二) 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体裁之争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体裁归属问题,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争议和考辨, 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 学者们的认识越来越明晰: 戏剧的雏形——戏剧文学——说唱文学——指图讲故事。

国外最早关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体裁的是德国学者葛玛丽, 她认为《弥勒会见记》是在回鹘人的“新日”(yangrkttñ) 时向佛教信徒们演唱的剧本“《弥勒会见经》可以说是(回鹘) 戏剧艺术的雏形。在民间节日, 如正月十五日, (回鹘) 善男信女云集寺院, 他们进行忏

① 参见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羨林文集》第 11 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 第 11 页。

② S. Lévi, *La Sūtra du Sage et du Fou dans la Littérature de L'Asie Centrale*, JA207, 2 (October-December 1925), pp. 304-332.

③ Werner Winter, *Some Aspects of "Tocharian" Drama: Form and Techniques*, Studia Tocharica, Poznan 1984, p. 48. 60-63.

④ 季羨林《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民族语文》1982 年第 4 期。

⑤ 季羨林《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文物》1983 年第 1 期。

⑥ 季羨林《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北京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

⑦ 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羨林文集》第 11 卷, 第 8 页。

⑧ 季羨林《新博本吐火罗语 A (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第十五和十六张译释》,《中国文化》1989 年第 1 期。

悔、布施,为死去的亲人进行超度,晚上听劝谕性故事,或者欣赏演唱、挂有连环画的故事。讲唱人(可能由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向人们演唱诸如《弥勒会见经》之类的原始剧本,或者讲说某法师同其学生关于教义的对话。从而达到向群众宣传教理的目的。”^①

国内最早对回鹘文本进行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冯家昇认为“它大概是由《贤愚经》卷十二《波婆离品》演绎而成的一种变文。”^②李经纬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这里的《弥勒会见记》、《弥勒会见经》和《弥勒三弥底经》等名称,实际上都是同一种回鹘文佛经的不同译名。”^③斯拉菲尔·玉素甫等认为《弥勒会见记》“是属于佛教小乘派的舞台作品”^④,它“充满了浓厚的剧本色彩,具备剧本的特征”^⑤。耿世民认为“《弥勒会见记》是公元八至九世纪用古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长达二十七幕的原始剧本,它不仅是我国维吾尔族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是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现存最早的剧本。”^⑥1986年,黎蕾从佛教、梵剧东传与回鹘剧的关系入手,详细分析了《弥勒会见记》的形式、内容,认为“它无疑是我国古代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戏剧表演艺术作品”^⑦。1999年,他又在《中国最早佛教戏曲〈弥勒会见记〉考论》^⑧中重申了此观点。

有学者对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剧本体裁提出了质疑。姚宝瑄对比了不同文本的《弥勒会见记》,发现从吐火罗文译为回鹘文时,它的戏剧特征明显减弱,已经变得类似讲唱了。^⑨沈尧指出“以无限制的全知视角连贯叙述一个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故事——这种叙事模式充分显示出,《弥勒会见记》已不具备戏剧的品格,而具备了叙事的讲唱文学的品格。”^⑩对此说法,曲六乙“还有保留”,他认为“中国戏曲剧本文学与传统说唱文学有着密切血缘联系,许多剧种的剧本文学脱胎于说唱文学”^⑪,通过对少数民族戏剧和傩戏的田野考察和对比,认为《弥勒会见记》具有戏剧和对话体叙事说唱文学的双重属性。^⑫孙崇涛也认为“它若是以佛教题材的剧本焉耆语本《弥勒会见记剧本》为蓝本改制,就不排除它仍是戏剧剧本的可能。”^⑬

《弥勒会见记》不同文本之转型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廖奔将这种转型的情况进行了阐述,认为回鹘文本戏剧因素不断减少的原因,乃是梵剧东渐、文化转型期的阶段性呈现物。^⑭至于为什么会转型,孙玫则认为“智护法师翻译《弥勒会见记》的动机,是弘扬佛法而非传播戏剧。由于回鹘文化里没有戏剧这种形式,他自然不会去硬性推广这种大家都还不熟悉的新形式,而改

① 葛玛丽著;耿世民译《高昌回鹘汗国(公元850—1250年)》,《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② 冯家昇《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1962年第7、8合期。

③ 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首品残卷研究》,《民族文学》1985年第4期。

④ 斯拉菲尔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章简介》,《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⑤ 斯拉菲尔等《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

⑥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研究》,《文史》1981年第12辑。

⑦ 黎蕾《印度梵剧与中国戏曲关系之研究》,《戏剧艺术》1986年第3期。

⑧ 黎蕾《中国最早的佛教戏曲〈弥勒会见记〉考论》,《中华戏曲》1999年第2期。

⑨ 姚宝瑄《试析古代西域的五种戏剧——兼论古代戏剧与中国戏曲的关系》,《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

⑩ 沈尧《〈弥勒会见记〉形态辨析》,《戏剧艺术》1990年第2期。

⑪ 曲六乙《宗教祭祀仪式:戏剧发生学的意义》,《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代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⑫ 曲六乙《中国戏曲史里一种怪现象——说唱文学输入戏曲的独特形态》,《中国戏剧》1995年第11期。

⑬ 孙崇涛《西域戏剧文献的发现及研究》,《民族艺术》1997年第2期。

⑭ 廖奔《从梵剧到俗讲——对一种文化转型现象的剖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用回鹘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讲唱形式来传播《弥勒会见记》的内容。”^① 学者们看到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独特的一面，借助传播学、宗教学等内容对文本进行综合考察，拓宽了研究。

研究者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体裁问题上，前后认识亦有不同。季羨林先生将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加以对照后认为“我始终强调的是吐火罗文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戏剧性质，而这种戏剧又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戏剧不同，是看图讲故事的戏剧。”^② 后来他指出，回鹘文本与吐火罗文本相比，“看上去一点剧本的痕迹都不存在了，但是内容却基本未变，它完全变成了一篇叙事文学作品”，之所以如此，他认为是因为宣扬弥勒信仰的对象变了，民族和传统庆典习惯变了，因此，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才由剧本转变为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非剧本的叙事文学。”^③ 耿世民先生曾确切地说过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戏剧，但“现在比较倾向于说它是戏剧的雏形，或相当于敦煌发现的汉文变相、变文文体，或是‘指图讲故事’”^④。美国学者梅维恒（V Mair）在《绘画和表演》（*Painting and Performance*）一书中讨论了《弥勒会见记》的文体，也认为是指图讲故事。^⑤ 季、耿两位研究《弥勒会见记》的专家，对回鹘文本的体裁认识，都从戏剧转向了叙事文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弥勒会见记》文体本身的复杂性。

《弥勒会见记》两种文字的写本虽然内容相仿，但风格两样，两者的剧本性质都不明显，尤其是在戏剧特征上后者更少。学者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讨论，不断加深对文本的认识，在争论和考辨中发现，单一的判定并不符合这一文本作为宗教剧的特殊性，结合多学科对文本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更科学地揭示它的真面目。文体之争其实都是看到了文本戏剧性的某一侧面，因为无论指图讲故事抑或讲唱文学，都与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原始戏剧阶段，首先我们不能用欧洲或者现代的戏剧概念或理论加以判定。其次，如果再结合当地民族习惯和宣传佛教的特点，那么这种带有浓厚的“突厥文化、回鹘文化”^⑥ 特色的宗教原始戏剧无论如何都可以视作是中外戏剧和宗教文化交流的特定产物。

五、有关《弥勒会见记》的其他研究

除了诸上研究内容，学者们还从宗教文化、语言学等方面对《弥勒会见记》展开探讨。

季羨林先生认为吐火罗文本“是一个佛典，内容基本上是小乘的，但是已经有了大乘佛教的滥觞”^⑦。维吾尔族学者亦认为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是属于佛教小乘派的舞台作品”^⑧。学界对弥勒信仰的研究，基本上以汉译佛经为主，《弥勒会见记》和新疆其他有关弥勒的佛教文献的出土，提供了印度佛教东传新疆的资料，弥补了弥勒信仰流播史研究资料的空白。季羨林先生对弥勒信仰在梵文、巴利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吐火罗文（包括《弥勒会见记》）佛

① 孙玫 《“中国戏曲源于印度梵剧说”再探讨》，《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② 季羨林 《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③ 季羨林 《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文史哲》2001年第1期。

④ 耿世民 《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弥勒会见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⑤ （美）梅维恒著；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 《绘画与表演》，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⑥ 郎樱 《西域佛教戏剧对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贡献》，《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⑦ 季羨林 《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⑧ 斯拉菲尔等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章简介》，《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教典籍中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将弥勒信仰经印度到新疆再到中原的传播路径及流布情况梳理出来,强调了弥勒佛在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印度佛教东传,新疆首当其冲。因此,弥勒在佛教东传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古代新疆各族(当时称城郭)人民,必先有所了解和觉察。这就是弥勒信仰在新疆许多地方都流行的根本原因。”“弥勒信仰在新疆以及后来在中国内地之所以能广泛流布,历久不衰,是与救世主思想分不开的。”而这种救世主思想又是受到了波斯的影响,“这与佛教小乘自力解脱的思想大相径庭,是佛教史上的一大转变,一大进步。”^①季先生的研究凸显了新疆在弥勒信仰传播中的地位,也看到了佛教东传时由小乘向大乘的滥觞轨迹。

耿世民对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具体的佛教内容中地域和天界部分的第20~27章进行了译释及研究,“介绍了中亚突厥人关于末日论的范例”,他联系另一回鹘文佛教文献《十叶道譬喻鬘》及印度撰述《大事》中的地狱描写,又结合印度佛教的《十诵律比丘戒》的僧人忏悔和西域俗人忏悔的特点(汉传佛教、摩尼教、景教、袄教的影响),认为《弥勒会见记》在地狱和天界思想“这方面虽溯源于印度,但它又是中亚各种宗教文化的综合产物”^②。除此之外,耿世民还就“德国本”第十品、第十一品、第十三到十六品的具体内容作了详细的文本译释和研究,其中不乏有关佛教内容的阐释。^③

学者们从印度戏剧和中国戏剧的关系对《弥勒会见记》进行了研究。很多学者都从《弥勒会见记》中看到了印度戏剧对西域戏剧、中原戏剧的影响。季羨林研究了《弥勒会见记》从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再入中国内地的传播路线,揭示出中印戏剧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影响。^④黎蔷认为“沿着佛教的足迹,印度梵剧事实上已东传我国,并影响和促进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和发展。”他指出,中国中原地区广为敷演的“目连戏”导源于西域佛教戏剧,“目连救母”戏剧情节最早就是出自《弥勒会见记》。^⑤廖奔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梵剧东来之势的形成和东渐轨迹及原因,阐述了《舍利佛传》和《弥勒会见记》在转型阶段的情形,论述了梵剧影响中国戏曲的叙事文体和音乐结构的情况。曲六乙认为“《弥勒会见记》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珍品,是研究我国多民族戏剧发展史的瑰宝,也是中外宗教戏剧交流的结晶。”“总之,从《舍利佛传》到《弥勒会见记》译本的发现,至少说明:一,作为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疆地区在吸收并传播外来戏剧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它进行的最早,吸收的最丰富,也显示了巨大的魄力。二,不论《弥勒会见记》等译本在新疆地区是否用回鹘语演出过(目前尚无确凿证明资料),作为一定程度上维吾尔族化的文学剧本,产生的年代远超过南宋的戏文剧本,这必将

① 季羨林《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文史哲》2001年第1期。

② 耿世民《回鹘文〈佛教启示录〉德文本序言》,氏著《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第299页。

③ 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第92~288页。

④ 季羨林《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季羨林《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文史哲》2001年第1期。

⑤ 黎蔷《印度梵剧与中国戏曲关系之研究》,《戏剧艺术》1986年第3期;黎蔷《敦煌学中目连与目连戏》,《戏曲研究》1990年第38辑;黎蔷《中国最早佛教戏曲〈弥勒会见记〉考论》,《中华戏曲》1999年第23辑;黎蔷《20世纪西域古典戏剧文本的发掘与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改变人们对我国戏剧发展史上的某些似乎已成定论的传统见解。”^① 郎樱、高人雄^②及龙志强^③等学者亦有相似的认识。

学者们对《弥勒会见记》还进行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劳特(J. P. Laut)于1986年在《早期突厥及其佛教文献》中,对回鹘文“德国本”和“哈密本”的语言进行了比较研究。张铁山逐字逐行地进行了不同文本间的语言比对。^④ 艾力·阿布拉研究了回鹘本《弥勒会见记》中的对偶词。^⑤ 热孜亚·努日对《弥勒会见记》的名词^⑥和方言归属^⑦进行了研究。迪拉娜·伊斯拉非尔对《弥勒会见记》的动词词法结构进行了统计和归纳。^⑧ 柳元丰从语音方面对《弥勒会见记》进行了语言学描述。^⑨

综上所述,学者们多角度的探讨,使得《弥勒会见记》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具体,《弥勒会见记》的研究也越加丰富。

(作者单位: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文洲

责任校对: 李文博

① 曲六乙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代序》,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

② 高人雄 《〈弥勒会见记〉与中国戏曲——古代维吾尔族戏剧与中国戏剧之刍议》,《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③ 龙志强 《印度梵剧影响中国戏曲研究述评》,《艺术百家》2007年第1期。

④ 张铁山 《吐火罗文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比较研究——以吐火罗文 YQ1.31 / 2、YQ1.31 / 1、YQ1.91 / 1 和 YQ1.91 / 2 四页为例》。

⑤ 艾力·阿布拉 《〈弥勒会见记〉之中的对偶词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6月。

⑥ 热孜亚·努日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名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4月。

⑦ 热孜亚·努日 《〈弥勒会见记〉属于 n-方言吗》,《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 迪拉娜·伊斯拉非尔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动词词法分析》,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⑨ 柳元丰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语音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